



大会

Distr.
GENERAL

A/HRC/11/6
18 May 200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理事会
第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增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暴力侵害妇女、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

亚肯·埃蒂尔克的报告 * **

妇女人权的政治经济学

* 由于本报告大大超出了大会相关决议目前所允许的字数限制，脚注原文照发。

** 本报告迟交，以列入最新信息。

内 容 提 要

本文件是我作为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依照人权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和第 7/24 号决议向人权理事会提交的第三份专题报告。第一章重点介绍了我在 2008 年和在 2009 年第一季度的活动。第二章讨论了妇女人权的政治经济观。

在对妇女人权问题的分析中常被忽视的当前政治经济秩序，对暴力侵害妇女现象的普遍性以及为消除此种现象所采取的努力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妇女的人身安全和免受暴力与支配着资源和权益的分配和使用的各种关系之物质基础以及与家庭、社会和跨国环境的权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限制或否定妇女权利的文化理由，其根源是特定的经济利益和权力动态。

防止暴力侵害妇女和确保新自由主义全球环境中的两性平等，需要采用整体性方针处理妇女的人权问题，超越于目前将权利二分为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处理方法。除非妇女的作用得到承认，其能力通过社会、经济和政治赋权得到支持，否则，向其允诺的人权仍将是一些抽象概念。本报告辨述了《世界人权宣言》所赋予的经济和社会权利与妇女的社会经济安全以及维护自己的意志和抵制暴力的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世界任何地方，妇女都不享有平等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也不能平等地获得生产性资源。新自由主义政策环境和武装冲突的泛滥，往往是由于争夺控制权和生产资源而造成的，从而阻碍了妇女获得这些资源的机会并增加了她们遭受暴力的风险。冲突以及冲突后和人道主义危机后的情势，往往以现有的性别、阶级和种族不平等为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加深了某些不平等和/或建立了新的不平等；因而重新配置了权益结构，这种结构极少惠及妇女。

然而，尽管全球化、冲突和目前的经济衰退对妇女带来新的风险，也对人权的保护带来了挑战，但也为驯服全球化和父权制提供了新机会。特别是，随着全球结构调整，进入有偿就业的妇女人数空前，这造成了新的矛盾，有可能会打破长期存在的使妇女永远处于从属地位的不平等结构。

报告最后向各国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提出了提高妇女享有其全部权利之途径的建议；并将其作为预防、保护和起诉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一项关键战略。为此，报告呼吁开展有性别意识与处理能力的治理，并呼吁国际社会承担共同责任，将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倡议纳入到人权运动内部为争取社会和经济平等而开展的广义斗争框架之内。

目 录

<u>章 次</u>	<u>段 次</u>	<u>页 次</u>
导言.....	1 - 2	4
一、活动.....	3 - 17	4
A. 实况调查访问.....	3 - 4	4
B. 大会.....	5	5
C. 区域协商.....	6 - 8	5
D. 其他会议.....	9 - 13	5
E.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被占巴勒斯坦领土问 题专家组.....	14 - 15	7
F. 通信和新闻发布.....	16 - 17	7
二、妇女人权的政治经济观.....	18 - 80	7
A. 导言.....	18 - 21	7
B. 政治经济学方法.....	22 - 40	9
C. 经济和社会权利.....	41 - 66	14
D. 全球变化和危机的影响.....	67 - 80	22
三、结论和建议.....	81 - 90	28
<u>附 件</u> ：暴力侵害妇女与政治经济学问卷的应答方和受访专家单.....		31

导 言

1. 作为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其原因及后果问题特别报告员，我谨此依照人权理事会第 1/102 号决定和第 7/24 号决议向人权理事会提交我的第三份报告。第一章概述了我在 2008 年以及直至 2009 年 3 月 31 日的活动；第二章讨论了妇女人权的政治经济学。

2. 我请理事会注意本报告增编。增编 1 概述了与暴力侵犯妇女相关的指称暴力侵犯人权行为及其原因和后果(已提请有关政府予以注意)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增编 2 是我对塔吉克斯坦访问的报告；增编 3 是我对沙特阿拉伯访问的报告；增编 4 是对摩尔多瓦共和国访问的报告；增编 5 回顾了过去 15 年来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增编 6 载有妇女权利的政治经济观问题研究情况，该项研究是本报告的基础。¹

一、活 动

A. 实况调查访问

3. 2008 年，应有关国家政府的邀请，我访问了沙特阿拉伯(2 月 4 日至 13 日)、塔吉克斯坦(5 月 15 日至 23 日)和摩尔多瓦共和国(7 月 4 日至 11 日)。2008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应土耳其政府的邀请，我与土耳其妇女权利问题欧洲议会报告员一起对土耳其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以评估向暴力行为的妇女受害者、包括向贩运妇女受害者提供庇护所的情况。尽管近年来土耳其已作出重大努力以更有效地应对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安全住所的数目仍然不足。此外，在庇护所的概念方法和所提供的服务标准以及在监测方面都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4. 我还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确定了访问邀请和日期，很遗憾，我不得不推迟此次访问，但我希望可以重新安排访问时间。我也向约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提出了访问这些国家的请求。

¹ I would like to thank Professor Jacqui True, at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for her research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women's rights, as contained in Addendum 6.

B. 大会

5. 2008 年 10 月 24 日，我向大会第三委员会作了发言。我向大会通报了载于 2007 年访问报告中的结果和我在 2008 年进行的国别访问中得出的初步意见。我还提请大会注意我的年度报告，年度报告讨论了暴力侵害妇女指标的重要性以及各国的应对措施；我重申有兴趣继续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就此问题进行合作，并向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提供支持，大会授权该委员会制定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指标。

C. 区域协商

6. 同往年一样，我出席了与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区域协商。我很高兴地向大家报告，在 2008 年举行了三次此类协商。

7. 2008 年 9 月 17 日至 19 日，我出席了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东欧和中亚地区非政府协商”。2008 年 10 月 15 日至 16 日，我出席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与亚太地区非政府组织进行的区域协商，该协商是与土著人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状况特别报告员一起举行的，重点讨论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暴力侵害土著妇女问题。

8. 2008 年 12 月 5 日至 6 日，我出席了“大湖和非洲之角地区冲突背景下的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区域协商会议”，该协商会议是与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一起在内罗毕举行的。

D. 其他会议

9. 在整个 2008 年和 2009 年第一季度，我以特别报告员身份参加了多项活动。以下列举了其中一些活动。

10. 2008 年 1 月 21 日至 26 日，我出席了在蒙特利尔和在纽约举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有罪不罚问题和妇女正义问题会议与协商；200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我出席了妇女地位问题委员会在纽约举行的第五十二届会议以及各国政府、联合国实体和非政府组织举办的一些活动。2008 年 3 月 27 日和 28 日，我参加了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在日内瓦举行的年度理事会会议。2008 年 5 月 6 日至 8 日，结合我的关于妇女人权的政治经济观问题专题报告，我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了

一次专家协商(下称“专家协商”),这是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基金)、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妇发基金)和比尔基大学的支持下促成的。我还出席了 8 月 4 日至 6 日在曼谷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的妇女赋权问题论坛和穆斯林妇女赋权协会咨询小组的会议;2008 年 9 月 7 日至 11 日,在科隆举办的冲突地区性暴力问题专题小组会议;以及 2008 年 9 月 12 日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在斯德哥尔摩举办的一次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会议。

11. 2008 年 11 月 5 日和 6 日,我与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主要当局和组织举行了一系列会议,并在社会性别和国际关系问题人权论坛上就北京会议以来关于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国际立法进展情况作了介绍发言;2008 年 11 月 19 日,我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对家庭的影响会议上作了主旨发言;在 2008 年 12 月 2 日至 4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的暴力侵害妇女问题议会应对措施会议上就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近期趋势和新形式作了发言。

12. 在 2009 年前三个月,我参加了下述活动:1 月 21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种族灭绝问题专家研讨会,在该研讨会上我强调论述了这一严重罪行的性别影响和层面;此后我与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进行了对话。在 2 月 13 日至 15 日在吉隆坡举行的平等组织促进穆斯林家庭平等与正义全球会议上,我作了主题演讲。2 月 17 日,我出席了在亚历山大举行的关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医疗和法律应对措施的研讨会;3 月 2 日至 6 日,在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我报告了我开展的活动,向委员会通报了今年的专题报告。我还参加了非政府机构和联合国机构组织的一些活动,其中包括在联合国纪念国际妇女节之际举办的一个小组讨论会,以及一个关于加强性别问题宣传以及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人权系统之间合作问题的小组讨论会。

13. 我在任务最后几个月期间开展的最新活动包括参加: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不同文明联盟第二届论坛(4 月 6-7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德班审查会议(4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举行的土耳其妇女问题听证会(4 月 30 日);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行的穆斯林世界民主和两性平等问题会议(5 月 8-9 日);以及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会议的各国联络议员会议(2009 年 5 月 15 日)。

E.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被占巴勒斯坦领土问题专家组

14.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7/20 和 S-8/1 号决议，我为“关于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提供技术援助事宜的七个专题特别程序和紧急审查该国东部地区状况的合并报告”作出了贡献，该报告提交给了理事会第十届会议(A/HRC/10/59)。在我审查自从我于 2007 年 7 月正式访问以来该国暴力侵害妇女的情况报告中，我遗憾地指出，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在该国各地依然猖獗，甚至在战争停止的地方也是如此，缺乏保健状况以及幸存者的极端贫困状况亦然。

15. 根据人权理事会 S-9/1 号关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特别是由于以色列最近对加沙地带发动军事攻击而受到严重侵犯事项的决议，我还审查了自从我于 2005 年正式访问之后以及遭受军事攻击之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暴力侵害妇女情况。

F. 通信和新闻发布

16. 在报告所述期间，截至 2009 年 4 月 2 日，我发出了 93 封信函，提请有关政府注意指称的侵犯人权情况。截至 2009 年 4 月 27 日，我收到了 38 份有关政府的复函。这些函件的分析见增编 1。

17. 2008 年和 2009 年 3 月 31 日前，我在如下各种场合发布了新闻稿，经常是与其他特别报告员联合发布的：2008 年和 2009 年 3 月 8 日国际妇女节；联合国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2008 年 6 月 26 日)；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2008 年 11 月 28 日)；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正在进行的打击妇女权利捍卫者的行为(2008 年 11 月 27 日)；关于 3 月 29 日议会和总统选举之后的津巴布韦局势问题(2008 年 4 月 29 日)。

二、妇女人权的政治经济观

A. 导言

18. 本报告以我所编写的“作为消除暴力侵害妇女手段的尽责标准”报告(E/CN.4/2006/61)为依据，该报告将文化论述和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确定为实现两性

平等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重大挑战。文化论述是我的 2007 年报告之主题，该报告题为“文化与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之间的关系”(A/HRC/4/34)，报告指出，解决文化问题和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可行战略必须纳入政治经济观点，以便理解文化与权力和支配关系之间的联系。本报告的部分目的是回应这种必要性。² 本报告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也有现实意义，预计经济危机会对妇女和女童产生过大的负面影响。

19. 本报告使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旨在分析新自由主义政策环境的挑战和超越经济和社会权利享有差异的纯分配观点，并确定存在哪些歧视性政策、作法和权益结构，这些政策、作法和结构决定了这些权利的性别化表现形式。本报告还论述了长期以来女权主义者对两公约中所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权利之二分法的批评。³

20. 政治经济学方法避免了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分割性和选择性处理，这种作法将问题与其根本原因和后果分隔开来。政治经济学方法为国家和其他行为者提供了一个框架，以履行其防止侵权行为以及无论在顺境或是逆境中保护和实现妇女人权的义务。

21. 在本报告第一部分，我探讨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参数以及目前人权范式和作法在认识并回应基于性别的歧视和暴力所依托的社会经济条件方面的局限性。在第二部分，我考察了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权利与妇女易受暴力侵害的脆弱性之间的相互关系。接下来讨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武装冲突、自然灾害和其他危机以及重建工作等全球进程对现有性别不平等和暴力侵害妇女风险问题的影响进行了讨论。报告最后就如何确保妇女能够充分实现其人权提出了建议。

² The report draws on: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literature; relevant reports of the previous Special Rapporteur o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E/CN.4/2000/68; E/CN.4/2001/73); reports from United Nation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on an expert consultation and online discussion forum; and responses to questionnaires sent to Governments and non-State actors. See Annex for lists of Governments and persons/organization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questionnaire or consultations.

³ Romany, Celina, “State responsibility goes private: A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Cook, Rebecca J. (ed.), *Human Rights of Wome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4, pp. 85- 115.

B. 政治经济学方法

22. 国际人权框架在处理妇女人权问题方面步伐缓慢。偏于处理公共领域侵犯人权现象的作法易使男性受害者受到特别关注并使其在私人领域的权威成为特权。因此，妇女在国际人权法下得不到补救，人权保护、预防和享有中的不歧视原则未能得到维护。使公私二分法的性别偏向更加严重的是，侵犯妇女权利现象常被置于相对论和本质论的文化论述之中，这两种文化论述忽视了不平等的、具有潜在剥削性的等级制度，并将妇女的权利视为可有可无。

23. 政府和国际机构应对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措施不成体系，处理方法上与广泛的妇女权利和平等关注隔绝开来。尽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3 条要求各国确保妇女享有其经济和社会权利，但政府很少将社会经济因素纳入针对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立法和政策应对措施。“人们考虑妇女人权问题时，通常想到的是暴力侵害妇女问题，而不是贫困、住房、失业、教育、水、食品保障、贸易和其他相关的经济和社会权利问题”。⁴ 因此，在人权运动内部将暴力侵害妇女问题与更广泛的争取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斗争分离开来的作法造成了将此问题视为妇女的唯一问题。⁵

24. 在其“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深层研究”中，秘书长注意到缺乏全面和综合的处理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方法(A/61/122/Add.1)。例如，千年发展目标就未明确地将消除暴力侵害妇女现象确定为一个独特的目标，由此可见一斑。同样，尽管秘书长为在 2015 年前终止基于性别的暴力而发起的“联合起来”运动提到了暴力的结构性和根本原因及后果，该运动的概况介绍并未探讨实现妇女的政治参与权、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平等程度以及该问题的普遍性之间的联系。⁶

25. 另一方面，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在关于若干国家报告的许多评论中，已认识到暴力侵害妇女(更具体而言，贩运、家庭暴力和剥削)与妇女缺乏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享有之间的联系。对于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对充分实现全世

⁴ Programme on Women'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Concept paper, p. 2. (at <http://www.pwescr.org/Concept%20Paper.pdf>).

⁵ Ibid.

⁶ Fact sheets are available at <http://endviolence.un.org/factsheets.shtml>.

界妇女和女童权利的影响(其中包括对其暴力侵害的潜在增加), 该委员会也表示了关切。⁷

26. 国际劳工局认为, 预计在世界大部分地区, 经济危机对妇女就业所产生的不利影响大于对男子就业的影响。⁸ 女性移徙工人和家庭佣工已是最先遭到解雇的群体, 这反映出她们在从事非全日制、弹性的和脆弱性工作, 也反映出将妇女劳动视为可有可无的性别偏见。⁹ 妇女集中在制造业和高价值农业等出口部门, 女性移民照料工作所挣收入汇款下降以及向女性农民和企业家微型贷款融资条件从紧预计也会对妇女收入和生计产生不利影响。¹⁰ 世界银行预测今年在发展中国家另有多达 5,300 万人陷入贫困, 从而使每天生活费不到 2 美元的总人数超过 15 亿人。这将严重危及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 其目标是到 2015 年大幅减少贫困、饥饿、孕产妇死亡率和文盲。这些令人担忧的迹象很可能对实现两性平等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目标带来严重挫折。

1. 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政治经济学方法之关键要素

27. 与传统经济学形成对照的是, 政治经济学方法明确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三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 它以例证表明权力的运作不仅是通过胁迫的方式, 而且还通过结构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而运作, 这些关系对家庭内和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益、特权和权威的分配和使用起着支配作用。政治经济状态与社会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互动, 并改变和重新塑造这些形态, 由此塑造了社会的性别特性和地位并划定了权利和自由的界限。

⁷ “CEDAW: Committee Concerned by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on Rights of Women and Girls”, Press release, 6 February 2009 (see <http://www.un.org/womenwatch/feature/financialcrisis/>).

⁸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Women: March 2009*, Geneva: ILO,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ilo.org/global/What_we_do/Publications/lang--en/docName WCMS_103456/index.htm).

⁹ Seguino, Stephanie, written statement to the Interactive Expert Panel on Emerging Issues: The Gender Perspectives on the Financial Crisis, held on 5 March 2009 at the fifty-third session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csw53/panels/financial_crisis/Seguino_25Feb09.pdf).

¹⁰ M. Buvinic (World Bank) written statement to the Interactive Expert Panel”(see note 9 above)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sw/csw53/panels/financial_crisis/Buvinic.formatted.pdf).

28. 政治经济学方法侧重于三个关键的结构要素，这些要素对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可能性和普遍性产生影响。

29. 第一个要素是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性别分工，它所依托的是性别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使妇女主要负责无偿的、而且往往是无形的家务劳动，从而造成男女在家庭中的不平等议价权。与女性通常在家庭中所从事的无偿照料工作相类似的公共领域中的护理职业也被低估了价值。生殖工作的国际化将这种分工扩展到跨国领域，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移民到富有国家为家庭提供照料服务。¹¹ 家庭范围内的严格角色划分限制了妇女的公共参与和获得市场上的经济机会，从而造成了使许多妇女陷于潜在暴力环境的等级结构。

30. 妇女权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所侧重的第二个要素是当代全球宏观经济环境。资本主义竞争推动了对廉价劳动力来源以及可使当地和跨国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条件的逐求。在此背景下，产业向边缘地区迁移使当地经济受到干扰并且使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急剧变化，增加了缺乏监管的低薪酬和无保障就业经济活动，并吸引了发展中国家妇女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工薪就业。

31. 虽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环境已使妇女就业扩大，但也导致其在市场上和家庭中的工作量的强化，并造成贫困的女性化，所涉及的尤其是低技能和边缘化的贫困妇女，她们缺乏生产资源和基本能力的获得机会。这种贫困、边缘化和缺乏保护性机制的状况使妇女易成为侵权目标并破坏了逐步实现其权利的前景。¹²

32. 新自由主义政策也削弱了国家对资本监管和课税的能力，从而产生了产权和契约的执法问题，¹³ 以及撤销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提供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启用基于社区的执法和生存策略(主要基于妇女的主动行动)已成为必须之事。社区化/“部落化”趋势的一个结果是，以文化/宗教为根基的非国家行为者在确定身份政治(往往基于保守/原教旨主义理想)和向穷困群体提供服务方面的作用得到

¹¹ See Parrenas, Rhacel Salazar,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¹² Elson, Diane, “Gender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in M. Molyneux and S. Razavi (eds.), *Gender, Justice, Development and Righ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78-114.

¹³ Ertürk, Korkut,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fragmentation: Towards a post-Walrasian Insight.” Paper prepared for Expert Consultation, Economics MA Program Friday Seminars, December 14, 2007 Istanbul Technical University, Istanbul, Turkey 2008.

了加强。这些趋势为普遍适用人权准则、尤其是妇女的权利和平等诉求带来了新的挑战。¹⁴

3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目前的金融危机为政府和国际机构提供了投资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产力和恢复经济需求的一个关键机会。这种投资，如果计划得好，具有扩大妇女经济机会和就业以及获得广泛的其他权利的潜力。研究表明，妇女的经济参与和收入可大幅促进整体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她们在财政和行政机构任职可减少腐败；¹⁵ 她们倾向于进行风险较小的投资，而且投资回报率高于男性。¹⁶

34. 妇女权利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第三个要素与战争与和平的性别化层面有关，它与父权制和全球化的差异化性别影响密切相关。暴力冲突往往与对权力和生产性资源的控制有关，它使暴力常态化并使其在整个社会扩散。国家和群体认可的暴力经常宣扬男性攻击性，在男性对妇女的暴力方面则将有罪不罚现象永久化。我的关于冲突国家和冲突后地区的访问报告以实例证明了暴力侵害妇女现象、冲突和黥武主义之间的联系。¹⁷

35. 冲突、战争和安全议程使社会贫困化，因为它们在军事开支和用于发展及保护人权(特别是保护妇女人权)的开支之间作了权衡取舍。¹⁸ 因此，冲突后重建

¹⁴ This is a complex phenomenon, certain aspects of which were addressed in my 2007 report on “intersections between culture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HRC/4/34). See also the Association for Women's Rights in Development (AWID) study based on the responses of more than 1,600 women's rights activists globally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s Exposed: Ten myths revealed about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s*, AWID, Toronto,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awid.org/eng/About-AWID/AWID-News/Ten-myths-about-religious-fundamentalisms>).

¹⁵ See Coleman, Isobel, “The payoff from women's rights,” *Foreign Affairs*, Vol. 83 No. 3 May/June 2004, pp. 80–95.

¹⁶ Barber, Brad M. and Odean, Terence, “Boys will be boys: Gender, overconfidence, and common stock invest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6 No. 1(2001), pp. 261–292.

¹⁷ See reports on my missions to El Salvador (E/CN.4/2005/72/Add.2), Guatemala (E/CN.4/2005/72/Add.3),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 (E/CN.4/2005/72/Add.4), Afghanistan (E/CN.4/2006/61/Add.5), and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HRC/7/6/Add.4); and the report of the previous Special Rapporteur entitle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erpetrated and/or condoned by the State during times of armed conflict (1997–2000)” (E/CN.4/2001/73).

¹⁸ Balakrishnan, Radhika, *Why MES with human rights? Integrating macroeconomic strategies with human rights*, Manhattan: Marymount Manhattan College, 2004, p. 34 (available at http://www.mmm.edu/news/images/MES-HR_9.71.pdf).

可能会涉及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私有化，由于妇女承担了更大的家务劳动负担¹⁹而且建立了妇女参与有限或无重大参与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妇女的权利退化了。²⁰

36. 政治经济学方法强调指出，没有公正的稳定是不可能的。已可证明的是，在许多冲突后情境中，政府将国家安全和选举机制的优先度置于人的安全之上的作法在长期而言是破坏稳定的。在妇女无法获得司法、人身安全和社会经济权利的情况下，她们遭受暴力的脆弱性在和平时继续存在。²¹

2. 将经济和社会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力整合一起

37. 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两个公约的二分法所产生的紧张关系(它将前者置于后者之上)限制了为改变性别不平等和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所依托的条件所作的努力。在这方面，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上的发言指出，“……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仍然过于经常地容忍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破坏，如果这种破坏也出现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方面，就会引发恐惧和愤怒的种种表现形式，社会引起人们协调一致地要求立即采取纠正行动”(E/1993/22, 附件三, 第5段)。

38. 在很大程度上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²²看成是根据一国现有资源情况可逐步实现的“应争取的”权利，而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视为须立即加以保障的“强制性”权利的作法也受到女权主义学者的批评，他们论证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实现也可视为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²³两公约都对政府规定了遵守不歧视义务的积极责任。虽然所有人权的实施都涉及经济和物质层面²⁴，但一国并不

¹⁹ Seguino, Stephanie, “The road to gender equality: Global trends and the way forward,” in G. Berik, Y. Rodgers and A. Zammit (eds). *Social Justice and Gender Equality: Rethink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Macroeconomic Polic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44-69.

²⁰ Klein calls this “disaster capitalism.” See Klein, Naomi,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June 2008.

²¹ See reports on the missions referred to in footnote 17 above.

²² In light of the theme of this paper, the focus is on economic and social (ES), rather than cultural rights.

²³ Elson, *loc. cit.* (note 12 above), p. 80.

²⁴ Nussbaum, Martha C., “Women’s bodies: Violence, security, capabilities,” in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 6, No. 2 (July 2005), pp. 167-183.

能以预算制约为由而不一视同仁地遵守改善在其管辖范围内人民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义务。例如，国家不能在进行宏观经济改革的同时实施可能会损害它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下义务的多边经济机制或贸易自由化政策。²⁵

39. 尽管有这些人权义务，各国在应对暴力侵害妇女问题时往往更注重改革司法和法律架构，而不是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增进妇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要求“国家承担满足基本需要的积极义务”和实施确保实现这一结果的务实战略。²⁶ 在全球变革和危机的背景下，这不仅对于妇女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而且对于防止性别差异的加深尤为关键。

40. 此处，很重要的是，应注意到全球结构调整增加了公司和国际机构的权力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在控制宏观经济进程方面的作用。这就要求扩大积极义务的概念，使其包括这些非国家行为者。²⁷

C. 经济和社会权利

41. 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妇女受益于全球化的机会同时避免其风险的能力由于两性不平等、不平等的权益结构、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不安全性以及国家监管和分配公平的能力削弱而遭到损害。系统地被拒绝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贫困妇女遭受更大苦难和侵权的风险最大。

42. 本节旨在建立暴力侵害妇女现象和妇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适足住房、财产、继承、食物、水、教育、保健权以及体面工作和社会保障权。这些权利在《世界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承认并得到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保障。

²⁵ Chinkin, *Christine*, “The protec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post conflict” , prepared for the Women's Rights and Gender Unit, OHCHR, Geneva, p.19 (available at http://www2.ohchr.org/english/issues/women/docs/Paper_Protection_ESCR.pdf).

²⁶ Rubenstein, Leonard, S., “How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can advance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A response to Kenneth Roth.”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26, No. 4 (2004), p. 851.

²⁷ See Clapham, Andrew, *Human Rights Obligations of Non-State Actors*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Academy of European La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ch 2006 (<http://fds.oup.com/www.oup.co.uk/pdf/0-19-829815-3.pdf>).

1. 适足住房权

43. 适足住房权不仅包括租用期保障，而且还包括享有公共服务的机会和参与物质、社会、法律和经济环境。缺乏适足住房可触发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反之亦然。²⁸ 由于缺乏获得替代性住房而特别易遭受暴力风险的人包括国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妇女、家庭佣工、贫困单身母亲以及在没有为受侵权妇女设置安全庇护所或负担得起的长期住房的国家中生活的女性暴力受害者。

44. 剥夺住房与暴力迫迁密切相关，例如在内部动乱局势中。暴力风险对于国内流离失所者和生活在难民营中的难民妇女和女童而言尤其严重，这些难民营缺乏隐私，她们可能被迫与陌生男性住在相同的宿营地或十分接近的地方，这增加了她们的脆弱性。性暴力已被明确证明是此种环境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一旦冲突结束，由于遭到破坏、被迫迁移到不同的地方、歧视性继承法、缺乏财产权和占住等情况，被遣返的妇女可能不再拥有可返回的房屋或土地。

45. 大型开发项目或重大国际活动可能涉及将贫困人口大规模地从自己的家园和土地上迫迁出去，以腾出理想地点或为该项活动修建基础设施。这些经常是由民兵或武装部队实施的迫迁对于妇女所造成的摧残影响是深重的，而且与迫迁之前、期间和其后的身体、心理和经济暴力发生率提高相关。²⁹ 由国家机关、非国家行为者、社区成员以及家庭暴力所实施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都是如此。

46. 对妇女的适足住房权的侵犯也导致在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灾难期间及其后的基于性别的暴力。一项就国际社会应对斯里兰卡和泰米尔纳德邦海啸背景中

²⁸ Proceedings, Asia-Pacific Regional Consultation on 'The Inter-linkages between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Women's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 hel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Special Rapporteur on adequate housing as a component of the right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and on the right to non-discrimination in this context, New Delhi, India, October, 2003: p. 37 and 54 (available at http://www.hic-sarp.org/interlinkages_VAW&RAH.pdf).

²⁹ Centre for Housing Rights and Eviction (COHRE), 2002, *Violence: the impact of forced evictions on women in Palestine, Nigeria and India* (available at http://www.cohre.org/view_page.php?page_id=328#article1131).

的住房重建进行的研究显示，妇女和女童的权利遭到了严重忽视。³⁰ 补偿一般交给了家庭的男户主，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不与妇女或仅妇女幸存的家庭分享。³¹

47. 强迫搬迁和迁离也对本节中讨论的所有其他权利产生影响。

2. 财产、土地和继承权

48. 适足住房权与财产、土地所有权和继承权具有内在相关性。土地所有权及其有效控制方面的性别差距是大多数农业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福利、社会地位和赋权方面性别差距的最关键的单一因素。³² 财产是可创造收入和带来安全感的一种生计维持资产。拥有土地可给予妇女经济权利和机会，使其避免易受暴力的情境。也可增加她们在家庭和整个社会中的议价权。

49. 在喀拉拉邦进行的研究发现，妇女的独立财产所有权使她们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从而起到了关键的遏止家庭暴力的预防作用。³³ 在肯尼亚，如同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许多其他地区一样，妇女的财产获得权取决于她与一名男子的关系。如果她与丈夫分居或其夫死亡，她就有失去她的家园、土地、家庭用品和其他财产的风险。在分居或离婚时不能确保平等的财产权使妇女难以离开暴力婚姻，因为她们可能被迫在家庭暴力与街头贫困之间作出选择。³⁴ 缺乏独立生存资源的妇女也可能会屈从于无保护性行为的要求，尽管有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和其

³⁰ Habitat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HIC), Report of a Fact-Finding Mission to Tamil Nadu, India and Sri Lanka South Asia Regional Programme, *South Asia Regional Programme, Housing and Land Rights Network, New Delhi Mission report*, 2005 (see <http://www.hic-net.org/document.asp?PID=277>).

³¹ Ibid.

³² Agarwal, Bina, *A Field of One's Own: Gender and Land Rights in South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South Asian Studies, 1994.

³³ Agarwal, B. and Panda, P., "Towards freedom from domestic violence: The neglected obvious."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for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Vol. 8, No.3 (2007), pp. 359-388.

³⁴ Human Rights Watch, *Double Standards: Women's Property Rights Violations in Kenya*, 3 March 2003, p. 25 (available at <http://www.hrw.org/en/reports/2003/03/03/double-standards>).

他疾病的危险。³⁵ 南非农村妇女经常生活在女性为户主的家庭中，她们处于长期贫困之中，遭受愈演愈烈的暴力，而且其艾滋病毒感染率也过高。其中许多妇女被种族隔离制度强行逐出她们的祖传土地。³⁶

50. 妇女在主张财产权和土地权方面的困难与其他性别歧视性法律有关，包括偏向男性的婚姻和离婚法，以及由男性组成的、将妇女排除于决策过程之外的土地纠纷机构内的偏向。暴力冲突情形以更加直接了当的方式揭示了，财产和土地权的侵权与身体上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分不开。在乌干达武装冲突中，军事化强奸被战略化地用以获取妇女的资产、包括土地和家园，其中有些是战争活动所需要的，或者说，是冲突的部分原因。妇女被迫入贫困，而且经常陷于流离失所状态，因而更易遭受持续的暴力侵害。³⁷

3. 食物权和粮食安全

51. 由于教育歧视、收入较低、家庭内部粮食分配不平等、公共卫生保健不足和被排斥于决策过程之外，妇女获取和控制其他生产性资源的能力有限，从而损害了妇女的食物权。妇女过重地承担着食品供应危机、食品价格上涨和食品供应私有化的影响。妇女承担家庭供养者和照料者的角色，而她们一般缺乏财产和劳动权利，在食品权益出现问题时，她们极易受到伤害。例如，为了家庭桌上有食物，妇女可能卖淫，从而担负遭受暴力和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风险。据报告，在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许多女孩和妇女被迫从事“生存卖淫”以获取食物。

52. 妇女农业生产者遭受贸易自由化和农产品市场变化的最不利影响。虽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她们占农业劳动者的大多数，但由于缺乏资源获取机会、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信贷、设备、培训和市场专门知识，农村贫困妇女被有利于大

³⁵ Dennis, Suzanna and Zuckerman, Elena, *Gender Guide to World Bank and IMF Policy-Based Lending*. Washington: Gender Action, 2006, p. 43 (available at <http://www.genderaction.org/images/GA%20Gender%20Guide%20to%20World%20Bank%20and%20IMF%20FINAL.pdf>).

³⁶ The South African Civil Society Information Service, “South Africa: Rural Women and Land Reform: When Will We move beyond the rhetoric?” 3 September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sacsis.org.za/site/news/detail.asp?iData=161&iCat=253&iChannel=1&nChannel=News>).

³⁷ Turshen, Meredith,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uring armed conflict in Uganda”, *Social Research*, Fall 2000, p.804.

规模出口经济作物生产的贸易自由化进一步边缘化。粮食安全问题反映了国际贸易分配不均所产生的一个最扭曲结果。

53. 贸易自由化锁定关税削减，减少了用于农业投资和提供可帮助妇女更有效率地生产粮食(包括为出口市场)的农业相关服务的可用资金。³⁸ 虽然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的《农业协定》允许出于粮食安全目的免除某些自由化义务，但还不清楚这些例外是否能提高贫困国家最贫困人口粮食安全。

4. 水 权

54. 为家庭和社区收集和提供洁净水的任务使妇女承受与提供食物相类似的风险和挑战。在缺乏手段获得清洁用水的社区，妇女往往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去取水。尼泊尔孕妇讲述了妇女为家庭取水的辛苦和在路途上流产的情况。³⁹ 同样，尼日利亚妇女报告说，她们在取水的路上被男人强奸或遭到野生动物袭扰。⁴⁰

55. 供水污染对妇女也有特别有害的影响。由于妇女去取做饭用水，出现健康后果她们可能会遭受责备；或者，如果当地水源不能再用，她们可能必需走更远的路去取清洁用水。砷中毒的贫困孟加拉妇女遭到社会排斥，所得医疗和营养也较少，从而增加了遭受暴力的机会。⁴¹ 美国/墨西哥边境的供水化学饱和将婴儿毒死于母亲子宫之中，而更多妇女则被诊断出乳腺癌。⁴² 妇女在争取获得清洁用水时，面临配偶虐待和社会责难，在秘鲁科波拉克有这方面的明证。⁴³ 获取洁净

³⁸ Spieldoch, Alexandra, *A Row to Hoe: The Gender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our Food System, Agricultural Markets and Women's Human Rights*, Geneva: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tradeobservatory.org/library.cfm?refID=96833>).

³⁹ Regmi Sabrina, "Nepali women and their struggles over water during Pregnancy."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9, No. 4 (2007), pp. 522-523.

⁴⁰ Rotimi, Olayinka, "Ogijo, Nigeria: Testimony" , *ibid.*, p. 521.

⁴¹ Hassan, M. Manzurul, Aitkins, P. J., Dunn, C. 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arsenic poisoning in Bangladesh" ,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Vol. 61(2005), pp. 2201-2211 (see <http://www.physics.harvard.edu/~wilson/arsenic/references/Hassan,%20Atkins,%20and%20Dunn.pdf>).

⁴² Sze, Julie, "Boundaries of violence: Water, gender and globalization at US borders" ,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9, No. 4 (2007), pp. 475-84.

⁴³ Delgado J. V. and Zwartveen, M., "The public and private domain of the everyday politics of water: The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and water power in the Andes of Peru" , *ibid.*, pp. 503-511.

水的斗争也对代际暴力产生影响，例如在美洲原住民文化内部由詹姆斯湾水电堤坝对加拿大克里族土地造成的洪灾所产生的暴力。⁴⁴

56. 发展中国家水的私有化，往往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政策的鼓励，已造成了自然垄断，导致价格上涨，特别加重了城市贫困者获取用水的负担。

57. 另一方面，便利获得清洁用水则与女童和妇女的赋权以及与保护她们免受暴力侵害有关。公平获得生产性用水可解决助长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贫困和两性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它使女童获得自由时间，这样，她们就可改善就学情况并改善创收机会和获得经济资源的机会，这可减轻妇女遭受暴力侵害的脆弱性。⁴⁵

5. 健康权

58. 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已将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确定为健康的根本决定性因素。⁴⁶ 在一项多国研究中，世卫组织发现，“曾在某个时刻经历过身体或性暴力或两者均经历过的妇女，与从未经历过伴侣暴力的妇女相比，报告存在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更大。”遭受过虐待的妇女称，在调查开始前的四个星期内，她们在行走和履行日常工作方面有困难、感觉疼痛、丧失记忆、头晕[和流产]”。⁴⁷

59. 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影响妇女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这是妇女健康权的一个关键内容。⁴⁸ 无论财富如何，暴力经历都对生殖健康产生不利影响。⁴⁹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幸存者有权获得充分的赔偿和涵盖身心健康的康复措施。⁵⁰ 但是，

⁴⁴ Ghosh, Nandita,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water: An introduction,” *ibid.*, pp. 443-454.

⁴⁵ Interagency Taskforce on Gender and Water, *Gender, Water and Sanitation: A Policy Brief*, 2006 (available at <http://www.unwater.org/downloads/unwpolbrief230606.pdf>).

⁴⁶ *Human Rights, Heal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Health and Human Right Publication Series, Issue No.5 (April 2005), p. 23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hhr/news/HRHPRS.pdf>).

⁴⁷ *Multi-Country Study on Women's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against Women*, Geneva, 2005, p. 14 (available at http://www.who.int/gender/violence/who_multicountry_study/en/).

⁴⁸ *Human Rights, Health and Poverty*”(note 46 above), p. 9.

⁴⁹ Kishor, S. and Johnson, K.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domestic violence: Are the poorest women uniquely disadvantaged?” *Demography*, Vol. 43, No. 2 (May 2006), p. 303.

⁵⁰ OCHR and WHO. *The Right to Health, Fact Sheet, No.31*, p.13 (<http://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Factsheet31.pdf>).

往往未提供这种支持。保健服务私有化可能会影响妇女幸存者获得保健的机会，因为已经证明，实行患者用户费用制大大降低了妇女到诊所的就诊率。⁵¹

60. 暴力侵害妇女问题也被视为是导致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一个首要原因，从而影响了妇女的健康权。⁵² 鉴于艾滋病毒/艾滋病日益女性化，⁵³ 消除暴力侵害妇女问题是减少这种流行病的一项关键干预措施。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或对于这种行为的恐惧也使许多妇女不能要求其伙伴采用安全性行为，从而导致更高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一旦诊断出染有病毒，许多妇女还遭受来自其伙伴的严重暴力。为照顾罹患艾滋病毒/艾滋病的家庭成员，她们可能会被迫进入色情行业等高风险工作或使子女、特别是女童辍学帮忙，从而加固了贫困和暴力的代际传递。⁵⁴

6. 教育权

61. 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是改善她们的能力和实现更大程度自信的一个前提条件。教育水平也被认为与增加获取知识和保健机会呈正相关的关系。从另一方面来看，缺乏教育可成为在家庭内部和外部边缘化与隔离化的一个主要原因，从而导致较低的地位并增加遭受虐待的脆弱性。

62. 虽然在世界许多地区女童的教育正在增加，但其受教育权经常因经济状况而受到侵犯。例如，当金融危机、私有化或进口自由化提升了生活费和食品费用时，女孩与男孩相比更易辍学。据估计，在目前在小学就读但将在学业完成之前辍学的 1.5 亿儿童中，至少 1 亿是女孩。⁵⁵ 童婚(对女童的一种暴力形式)与女童的受教育程度较低有关，这限制了她们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安全以及她们在家庭内获得社会与经济资源和决策的机会。⁵⁶

⁵¹ Ibid, p. 27.

⁵² See my report on “intersections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HIV/AIDS” (E/CN.4/2005/72).

⁵³ Today 50 per cent of the 30.8 million adults with HIV are women.

⁵⁴ UNFPA, *The State of World Population 2008*, p. 61.

⁵⁵ Dennis and Zuckerman, *op. cit.* (note 35 above), p.10.

⁵⁶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ICRW), *Knot Ready: Lessons from India on Delaying Marriage for Girls*, Washington and New Delhi, 2008 (available at http://www.iiav.nl/epublications//2008/Knot_ready.pdf).

63. 虽然一般而言妇女教育程度越高经历暴力行为的风险越低，但一些研究显示与此相反的模式。“受过教育的妇女了解自己的权利，因此不会不假质疑地遵从命令。提出疑问会导致冲突，进而导致暴力”。⁵⁷ 可将这些结果解释为父权制对于妇女通过教育所新赋有的权力以及这种赋权对于男性在家庭和整个社会中的统治地位的挑战之反弹。

7. 工作、生活和社会保障权

64. 有偿工作，特别是市场条件下的有偿工作，可为妇女及其家庭确保生计并为其提供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因此，有偿工作增强了妇女摆脱贫困和以下具有侵权可能性的环境：例如“拥挤的生活条件、有限的行动范围以及心理压力。”⁵⁸ 虽然证据显示，妇女收入可能会引发终成暴力的配偶怨恨，⁵⁹ 但获得有偿工作可为妇女提供更大的议价权或离开虐待性关系的可能性，在全球的北方和南方国家都是如此。⁶⁰ 收入和就业中的性别平等已经证明比教育本身对妇女地位和性别平等的影响更大。⁶¹ 就业可赋予妇女权力，使其更有效地对抗父权制控制和习俗，例如早婚、一夫多妻制以及可增加暴力侵害妇女行为风险的歧视性继承权和土地权。⁶²

65. 妇女的就业机会往往出现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交汇处，在这种制度下，男性养家糊口模式和不均衡的市场权益结构尤其不利于很少有或根本没有可

⁵⁷ Hombrecher, Una et al. *Overcoming Domestic Violence: A Global Challenge*. Social Service Agency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 in Germany, Stuttgart, 2007, p. 47 (available at [http://www2.wcc-coe.org/dov.nsf/51bb65526e8149bac1256c1c003547c6/6714af73bd48efe9c12574aa003d0616/\\$FILE/BfdW-BUCHHuslGewENGL_final2.pdf](http://www2.wcc-coe.org/dov.nsf/51bb65526e8149bac1256c1c003547c6/6714af73bd48efe9c12574aa003d0616/$FILE/BfdW-BUCHHuslGewENGL_final2.pdf)).

⁵⁸ Ibid., p. 33.

⁵⁹ S. R. Schuler, S. M. Hashemi, and S. H. Badal, “Men’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Bangladesh: Undermined or exacerbated by microcredit programme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 8, No. 2 (1998), pp. 148-157.

⁶⁰ Farmer Amy and Tiefenthaler, Jill,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domestic violence”,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Vol. 55, No. 3 (1997), pp. 337-358.

⁶¹ Seguino, *loc. cit.* (note 19 above), p. 52 and 67.

⁶² Blumberg, Rae Lesser, “Income under female versus male control: Hypotheses from a theory of gender stratification and data from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Vol. 9, No. 1 (March 1988), pp. 51-84.

支配资源的贫困妇女。大多数劳动妇女缺乏获得公共福利的机会，例如托儿服务、社会保障福利和养老金。⁶³ 竞争全球化，虽然扩大了妇女的就业机会，但其就业条件却不稳定，其中包括分包、外包和离岸生产等，这些形式从性质上说就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无监管的。

66. 进入本国劳动力市场或作为移民进入外国劳动力市场的许多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贫穷妇女，经常在缺乏最低的劳动和人权标准的工作岗位上工作。一些北方国家鼓励妇女非全日制就业，这种就业没有经济独立性和职业保障，也不保障职业发展机会。⁶⁴ 这种状况，总体而言，维系了妇女的从属地位；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使妇女遭受更大的暴力和受剥削风险。但是，与此同时，劳动力(包括移民劳工在内)的女性化产生了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可能会打破父权制结构和扩大妇女的自主权。这方面的公共政策在增强父权制或促进妇女人权方面可发挥关键作用。

D. 全球变化和危机的影响

67. 本节侧重于暴力侵害妇女问题与全球变革模式之间的联系，为此，它确定了一些战略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政治经济进程可被视为加重了现有的两性不平等或创造了新的包容与边缘化模式。⁶⁵

1. 竞争全球化

68. 新自由主义政策使经济向全球竞争开放并设法降低生产成本。这为妇女获得具有赋权潜力的有偿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是，由于经济波动性、

⁶³ Orloff, Ann Shola, "'Women's empowerment and welfare regimes: Globalization, export orientation and social policy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Soc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s*,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p. 29-30 (available at <http://www.unrisd.org/unrisd/website/document.nsf/0/58EC1361F09195F7C1256C080044FC77?OpenDocument>).

⁶⁴ For example, see the report on my mission to the Netherlands (A/HRC/4/34/Add.4).

⁶⁵ The report does not claim to make causal links between neoliberal policy and the violation of women's rights but rather, on the basis of available empirical evidence, it aims to identify trends and tendencies.

工作不稳定、分包和丧失生计，贫穷妇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妇女遭遇了新的脆弱性和风险。

69. 此外，在不安全和失业的条件下，男子可能会变得一无所有和无所适从；在这样的条件下，男性心理和权力关系被改变。这可能会加剧在家庭和公共场所对妇女和儿童的攻击，以弥补控制的丧失。⁶⁶ 最近在种族隔离后的南非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面临长期失业的男子提及自己的无能为力感，作为对女性伴侣实施暴力行为的理由。⁶⁷

2. 向市场经济过渡

70. 与宏观经济政策(包括促进全球市场一体化的结构调整政策)相关的经济不稳定格局，因国而异。然而，在女性的不平等与脆弱性方面也发现有类似的跨国趋势。例如，中东欧和前苏联的市场转型导致以下问题的普遍增加：贫困、失业、困苦、收入差异、不满、社会支持网络崩溃和妇女地位的普遍丧失。这些因素增加了妇女的依赖性，并增加了她们在家庭内外易遭到虐待的脆弱性。⁶⁸ 有些人将东欧和中亚地区视为判断新自由主义政策影响的“试验区”。⁶⁹ 尽管有例外，在许多转型国家，妇女的经济和社会地位都有退步，⁷⁰ 迫使数十万年轻妇女迁移以逃避家庭暴力和赡养子女，其中许多人被贩运成为性剥削和劳动剥削对象。

71. 同样，亚洲金融危机(1997-1998 年)对妇女和女童的影响也过大。由于公共服务工作岗位和薪金的削减，女童辍学在家中帮忙或被迫从事色情行业以支持

⁶⁶ Seguino, *loc. cit.* (note 19 above), p. 48; Chant, Sylvia, “Men in crisis? Reflections on masculinities, work and family in Northwest Costa Rica,” in Jackson, C. (ed). *Men at Work: Labour, Masculinities, Development*. London: Frank Cass, pp. 199-218.

⁶⁷ F. Boonzaier. “Woman abuse in South Africa: A brief contextual analysis.” *Feminism and Psychology*, Vol. 15, No. 1 (2005), pp. 99-103.

⁶⁸ True, Jaqui, *Gender, Globalization and Postsocialism: The Czech Republic After Commun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⁶⁹ Elson, *loc. cit.* (note 12 above).

⁷⁰ See the reports on my missions to the Russian Federation (E/CN.4/2006/61/Add.2), Moldova (A/HRC/11/6/Add.4) and Tajikistan (A/HRC/11/6/Add.2).

家庭生计。⁷¹ 在一些东亚国家，妇女的有偿劳动增加了；而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韩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政治不安全使家庭内部关系紧张化，增加了自杀率、家庭暴力和遗弃现象，⁷² 激发私人 and 公众对妇女权利的反弹，这种反弹往往以文化和传统作为辩护理由。⁷³ 从这些经验中汲取的教训对于监测和应对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而言特别重要。

3. 自由贸易区和移民妇女

72. 贸易自由化促进了从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出口导向战略需建立免受许多政府规章管制的劳动密集型“自由贸易”或出口加工区。出口加工区吸引了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妇女，她们以临时和无保障合同受雇于人。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此类自由贸易区内有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非自愿怀孕检查、性骚扰、强奸和杀害妇女⁷⁴ 事件的明证。⁷⁵ 工业的自由化也可能会涉及外国男性工人

⁷¹ Truong, Thanh-Da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Asian miracle and crisis: Enlarging the conceptual map of hum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Vol. 1, No. 1 (2001), pp.159-164.

⁷² Floro, Maria and Dymski, Gary, “Financial crisis, gender, and power: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World Development*, Vol. 28, No. 7 (July 2000), pp. 1369-1383.

⁷³ “Montréal Principles on Women’s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Human Rights Quarterly*, Vol. 26, No. 3 (August 2004), pp. 760-780, in particular Principle No. 3, p.763.

⁷⁴ While the femicides are said to have different motives, including domestic violence, many of the murdered women worked in precarious jobs, including the export industries. Organized crime, such as trafficking in drugs and persons that also grew in Ciudad Juarez following trade liberalization is said to contribute to the conditions that account for the femicides. See “Report on Mexico produced by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under article 8 of the 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and reply from the Government of Mexico” (CEDAW/C/2005/OP.8/MEXICO)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cedaw/cedaw32/CEDAW-C-2005-OP.8-MEXICO-E.pdf>); also the report on my mission to Mexico, (E/CN.4/2006/61/Add.4).

⁷⁵ See the reports my missions to El Salvador (E/CN.4/2005/72/Add.2), Guatemala (E/CN.4/2005/72/Add.3), Mexico (E/CN.4/2006/61/Add.4).

的输入。⁷⁶ 如果当地经济状况贫困化，他们的存在可能会鼓励卖淫业、性贩运以及基于性别暴力的发展。

73. 全球化背景下对妇女的廉价劳动力、低工资和灵活的劳动力的需求并不限于出口加工区，而是横跨多种形式和空间，其中包括贩卖妇女和儿童进行性剥削和劳动剥削、在无监管、非正规和家政部门中就业的移民以及在护理等受监管服务部门行业的移民。前者已成为一个利润丰厚的业务，合法和非法承包商可获高额利润；后者则是移民输出国硬通货的一个重要来源。“总体结果是全球生存的严重女性化，这不仅是涉及到妇女本身的生存，而且涉及到其家庭、政府和经济行为者之生存。”⁷⁷

74. 有人论证说，在便于妇女移民的全球城市中，“同样是那些促使工厂和办公场所迁往国外的进程，也有助于大量提供低工资就业岗位”。⁷⁸ 在大城市中妇女、移民和有色人种日益增加以及中产阶级日益减少促进了贬值进程的运作。性别化(例如，女性类工作岗位的贬值)助长了全球城市中由日益增加的、多为女性的“服务阶层”从事的多种工作的贬值。⁷⁹

75. 关于移徙现象对移民妇女本身的影响，现有证据显示出赋权和去权倾向。总的来说，由于工作环境中的高度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妇女集中于避开监管机制的部门，移民妇女处于性别、阶级、国籍和种族多重压迫下的侵权环境之

⁷⁶ For example, the presence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fisheries and forestry industrie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which import foreign male workers has been linked to the sex-trade, child prostitution and HIV/AIDS. See Sullivan, Nancy and Ram-Bidesi, Vina, “Gender issues in tuna fisheries: Case studies in Papua New Guinea, Fiji, and Kiribati” , Honiara, Solomon Islands: Forum Fisheries Agency & Pacific Islands Forum Secretariat, 2008.

⁷⁷ Sassen, Saskia, “Strategic instantiations of gender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 the feminizing of survival,” Unpublished paper prepared for the Expert Consultation (see paragraph 10 of the present report), p. 1.

⁷⁸ Sassen, Saskia,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Y: The New Press, 1998, p. 112.

⁷⁹ Sassen, Saskia, “Strategic instantiations of gendering: Global cities and survival circuits” (<http://portal.unesco.org/shs/en/files/7374/11090837201SaskiaSassen.pdf/SaskiaSassen.pdf>), see also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9.

中。⁸⁰ 她们易遭受暴力的脆弱性尤其被如下情况加剧了：在社会地位低的恶劣条件下工作、在有辱人格的住房条件中生活、缺乏基本的法律保护和补救机会。

76. 国际机构、雇主、企业和政府在人权侵权和暴力侵害移民家庭佣工方面串通一气，因为这些人不享有向其他劳动者保证的基本劳动保护。⁸¹ 雇主可以逃避国内劳动法，政府很少为家庭佣工监测劳动法的遵守情况。⁸² 劳务输出国往往有经济诱因无视这些违规情况，因为它们受益于高额汇款，不希望危及与有关东道国的关系。双边和多边协定不足以向移民、特别是妇女提供保护。⁸³

77. 从事色情业的移民妇女和被贩运进行性剥削的移民妇女面临特别的脆弱性。贩运是移民的黑暗面，它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进程密不可分。⁸⁴ 在预防和起诉贩运以及提供相关保护的工作中，将被贩运妇女视为罪犯或仅将其视为需要救援和康复的受害者的国家政策，未能考虑到她们的经济作用和人权。

4. 危机后重建与国家构建

78. 由于武装冲突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在性和身体方面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因之增加，这方面有很多明证。在无数历史上的和近期冲突中，大规模强奸妇女都是一种军事策略。⁸⁵ 武装冲突的原因往往与控制石油、金属、

⁸⁰ Piper, Nicola. “Feminization of labor migration a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ter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responses in Asia” , *Violence against Women*, Vol. 9, No. 6 (2003), p 724.

⁸¹ See the report of my mission to Saudi Arabia (A/HRC/11/6/Add.3).

⁸² Varia, Nisha, “Globalization comes home: Protecting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rights,” in *Human Rights Watch World Report 2007*, p. 1 (available at (<http://www.hrw.org/legacy/wr2k7/essays/globalization/index.htm>)).

⁸³ To date only 41 countries, mainly labour exporters, have ratified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⁸⁴ Truong, Thanh-Dam, “Organized crime and human trafficking,” in Viano, E.C., Magallanes, J., and Bridel, L. (eds), *Transnational Organized Crime: Myth, Power and Profit*. Durham: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3, pp.53-69.

⁸⁵ See Kelly, Liz, ‘Wars against women: Sexual violence, sexual politics and the militarized State’, in Jacobs, S, Jacobson, R., and Marchbank, J.(eds), *States of Conflict: Gender, Violence and Resistance*, London: Zed Books (2000), pp. 47-52.

钻石、毒品等经济资源或有争议的领土边界的企图有关。⁸⁶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往往是实现这种控制的一种途径，这在许多最近发生的武装冲突中都得到了证明。

79. 自然灾害所致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也会遭受强奸、性虐待、早婚和强迫婚姻以及被贩运，⁸⁷ 这对危机后或冲突后局势中妇女的权利和福利有着长期的影响。⁸⁸ 例如，被强奸的妇女背负污名有时甚至被迫迁移，这往往造成她们的贫困并继续遭受暴力。

80. 在冲突后局势中忽视妇女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造成了妇女的贫困和物质上的无保障状况，从而增加了她们遭受虐待包括被贩运的脆弱性。⁸⁹ 在冲突或灾害期间及其后发生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隐蔽性加剧了重建和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性别不平等和妇女的边缘化，尽管安全理事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的第 1325(2000)号决议确认妇女有权参与这些进程。⁹⁰ 研究表明，如果在危机后的社会重建过程中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无歧视的方式得到确保，⁹¹ 妇女就能够在冲突后局势中获得赋权。⁹²

⁸⁶ El Jack, Amani, *Gender and Armed Conflict: Overview Report*, Bridge Development – Gender,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3), p.8.

⁸⁷ Felten-Biermann, Claudia, “Gender and natural disaster: Sexualized violence and the tsunami” , *Development* Vol. 49, No. 3 (2006), pp. 82-86.

⁸⁸ O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armed conflict for women see report of the previous Special Rapporteur (E/CN.4/1998/54).

⁸⁹ Chinkin, *loc .cit.* (note 25 above), p. 11. See also, Enarson, Elaine, *Gender and Natural Disasters*, ILO: Recovery and Reconstruction Department, September 2000, (<http://www.unisdr.org/eng/library/Literature/7566.pdf>).

⁹⁰ Wilson, Jennifer, Phillips, Brenda D., and Neal David M. “Domestic violence after disaster” in Enarson, E. and Morrow, B. H. (eds.), *The Gendered Terrain of Disaster: Through Women’s Eyes*, Westport, CT: Greenwood, 1998, pp. 115-123.

⁹¹ Bernard, Cheryl, Jones, Seth G., Oliner, Olga, Quantic Thurston, Cathryn., Stearns Lawson, Brooke, Cordell, Kristen, *Women and Nation-Building*, Stanford: RAND, 2008.

⁹² Holt, Maria, “Palestinian women, violence, and the peace process” , in *Development, Women, and War: Feminist Perspective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Oxfam, 2003, pp. 223-38. See the increases in women’s empowerment in post-genocide Rwanda on the website of PRO-FEMMES/TWESE HAMWE (www.profemme.org.rw).

三、结论和建议

81. 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是对生命权和人身安全的侵犯，也是对一系列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侵犯。然而，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差别化对待和实施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它极大限制了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为充分和平等地实现妇女的人权以防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发生而做出的努力。

82. 在此背景下，本报告考察了目前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与妇女享有人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对于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影响；报告论证指出，经济和社会权利对于提高妇女的能力和创造有利条件而言至关重要，从而使妇女不必过度地承受全球化和经济危机的影响并能有效地避免(抵御)暴力风险。

83. 虽然竞争全球化为某些妇女群体创造了新机会，但它使另外一些群体处于不利地位，这些群体是在无保障和不受监管的条件下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从而创造了遭受侵权和剥削的新风险和脆弱性。与此同时，全球化破坏了国家的执法能力和提供公共品与服务的能力。这导致了向基于社区的执法和生存体系的回归，这种回归不仅强化了妇女的工作量，以弥补关键的公共服务和权益流失，而且还将妇女置于越来越保守的文化论述之下，这种论述对权利的普遍性和妇女的平等提出挑战。

84. 移徙的女性化，与劳动力的女性化一起，是全球化的两个重要结果；这两个结果既蕴含新的风险和脆弱性，又为妇女的赋权带来机遇。但是，忽视个人与家庭的基本的社会和经济权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使暴力成为比妇女的赋权更有可能的结果。侧重于国家安全的限制性移民政策以及狭隘的经济利益观往往限制了移民女工在外国环境中安全和独立生存方面的选择。所面临的挑战是为妇女创造不失尊严的安全移民保障。⁹³

85. 目前的金融危机清楚地反映了无监管市场的内在不稳定性，危机为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提供了投资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以创造工作岗位、提高生产率和恢复经济需求的一个重大机会。这种投资，如果设计得好，具有扩大妇女的经济机会和提高生计保障的潜力。毫无疑问，国家不是唯一应为侵犯妇女人权问题

⁹³ Varia, *loc. cit.* (note 82 above).

承担责任的当局。新的全球秩序中的主权必须理解为民族国家的责任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所共同承担的责任。因此，促进和保护妇女的经济和社会权益以防止并保护她们不遭受暴力的努力必须以跨国方式开展。人权和分配正义的未来要求将文化、政治和经济霸权民主化。

86. 考虑到上述讨论，针对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的根本社会经济原因的一个可行战略必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广泛准则，这些准则适用于各国政府以及当地和国际非国家行为者：

87. 建立一个性别敏感知识库如下：

- (a) 制定指标并建立按性别分列的风险数据以及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预防因素，其中包括经济和政治因素；
- (b) 建立冲突、冲突后和其他重建进程中暴力侵害妇女问题按性别分列的数据、其原因和后果；
- (c) 记录妇女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的不足之处，与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侵权相对等；
- (d) 列入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指标和具体目标，包括妇女的经济和政治参与措施(千年发展目标 3：赋予妇女权力)以及开发署的性别与发展指数和性别赋权指数。

88. 制定性别权能政策和方案如下：

- (a) 设计社会和服务部门的公共工程方案以促进妇女的就业并支持其作为经济行为人的作用，为此应为家庭和社区更大的社会保障需要作出贡献；
- (b) 提供着眼于冲突和危机后社会中赋予妇女权力的经济与社会层面的无歧视性的经济机会和重建方案；
- (c) 将经济和社会权利纳入可执行的国家法律，其中包括最低收入、食品、医疗保健等的保障；
- (d) 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指导下，从性别观点评估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所有政策，以防止经济自由化、金融与结构调整政策和方案以及贸易协定不对妇女产生消极后果——至少这些政策应“不造成伤害”；

- (e) 在发展融资举措中应考虑到暴力侵害妇女问题、其原因和后果，其中包括性别平等基金和其他致力于新的制度机制、研究、数据和行动计划的伙伴关系；
- (f) 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级采用性别回应预算战略

89. 监测如下进展：

- (a) 确保经济刺激和重建/恢复方案不将有形基础设施投资置于社会基础设施投资之上，亦不将支持男子就业置于支持妇女就业之上，不将不同经济部门的全日制经济机会置于非全日制经济机会之上；
- (b) 建立中间机构管理和监督外籍家庭佣工的权利；
- (c) 使用趋势或模式方面的跨国数据，这些趋势或模式显示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与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联系(即对收入和生产性资源的控制)；并在个人或家庭的整个生命周期进行跨时间监测。

90. 在跨国合作领域：

- (a) 投资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以创造工作岗位、提高生产率和恢复经济需求；
- (b) 制定机制，使包括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内的非国家行为者对侵犯人权行为负责，并使其制定性别敏感方法用于开展各项活动并制定性别敏感政策；
- (c) 引导国际援助用于实现经济和社会权利；
- (d) 建立跨国机制，以促进和保护妇女的各项权利并消除暴力侵害妇女现象。

附 件

暴力侵害妇女与政治经济学问卷的应答方和受访专家名单

A. 国 家

阿尔巴尼亚	希腊	塞尔维亚
阿根廷	危地马拉	新加坡
巴林	匈牙利	斯洛文尼亚
白俄罗斯	伊拉克	西班牙
玻利维亚	牙买加	斯里兰卡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日本	苏丹
加拿大	拉脱维亚	瑞士
智利	黎巴嫩	叙利亚
哥伦比亚	墨西哥	塔吉克斯坦
克罗地亚	摩尔多瓦	泰国
塞浦路斯	摩纳哥	特立尼达
捷克共和国	新西兰	突尼斯
萨尔瓦多	挪威	土耳其
爱沙尼亚	秘鲁	乌克兰
法国	菲律宾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芬兰	罗马尼亚	合王国
德国	俄罗斯	美利坚合众国

B. 民间社会应答方和受访专家

Alys Willman,	美利坚合众国
Bina Agarwal,	印度
Dianne Elson,	联合王国
Don Clark,	新西兰
Federica Donati,	人权高专办
Floretta Boonzaier,	南非
Haris Gazdar,	巴基斯坦
Indira Hirway,	印度
Jane Huckerby,	美利坚合众国
Kathryn Dovey,	商界领袖的人权倡议
Korkut Ertürk,	美利坚合众国/土耳其
Luz Angela Melo,	人口基金
Mara Bustelo,	人权高专办
Mayra Gomez,	(住房权利及迫迁问题中心)
Neetha Narayana Pillai,	印度
Radhika Balakarishnan,	印度/美利坚合众国
Saskia Sassen,	美利坚合众国
Samantha Hung,	新西兰
Shawna Sweeney,	美利坚合众国
Susan Deller Ross,	美利坚合众国
Sylvia Walby,	联合王国
Zina Mounla,	妇发基金

-- -- -- -- --